

總結最初·終結起始 ——李黎老師專訪



訪問、撰文：謝潤蓮

初雪的軌跡……

從早期自台灣旅美留學的少年「黎陽」；到處於鈞運挫折而努力掙扎起來、隱姓埋名的青年「薛黎」；然後沉澱、傷癒，最後重新出發的中年「李黎」。二十多年間的心路歷程、變化更新，李黎老師藉着編撰《初雪》一書，記錄了她的這段歲月。

從第一篇到最後一篇在創作時間上相距 21 年之久，除了是作為這段歲月的心路歷程的記錄外，老師在編選時還有沒有甚麼準則呢？對此，李黎老師表示自 1970 年出國，其時正逢上「海外五四」——台、港留學生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因參與鈞運，她的名字上了台灣政府的黑名單，十五年不能回台灣。所以直到 1986 年在台灣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最後夜車》¹，用的還是在美國「隱姓埋名」得到台灣小說獎的筆名「薛荔」。

1 其實李黎老師真正的「第一本」作品是《西江月》，早在 1980 年於北京出版。

後來台灣解嚴，老師以「李黎」之名發表了許多文章、出了十多本書。後來她想：應該讓這本「異名」之書歸隊了。於是，她在1998年把《最後夜車》的版權收回，易名出了增訂新版；刪去原先八篇裏自己不甚滿意的一篇，增收兩篇90年代的「新」作，其中一篇名為「初雪」，更以此作為這本新編小說集的書名。

《初雪》裏的第一篇〈譚教授的一天〉寫於李黎老師剛出國不久的1971年，而最後一篇〈棋局〉則發表於1992年。中間是21年漫長的時間，也是老師人生變化最大的一段歲月。李黎老師道：「雖然《最後夜車》之後我出了六、七本小說集，短中長篇都有，但《初雪》裏有我極珍視的早年作品，也有在人生大慟與大悟之後寫出的〈初雪〉與〈棋局〉兩篇，所以這本書對我是有特別意義的。」

小說集裏各篇章的次序編排除了是按時序而編，李黎老師在編撰時亦下了一番心思。她指出，《初雪》裏的小說既然有新有舊，時間跨度極大，所以各篇章的編排次序就按照寫作的時序，因為寫作的時間最能反映作者當時的心境和環境背景。那麼最後的兩篇，不僅是因為後來才寫的，亦是她人生另一個階段的書寫，故也就有作為「壓卷」之意。

《初雪》九篇文章中，要數〈夜樹〉最為震撼筆者。〈夜樹〉以台灣的軍眷村子作背景，讓讀者透過閱讀該作品時深刻體驗到當中的拉扯和矛盾。隨着國民黨退守台灣的軍眷在社會如此動盪、政局如此不穩之時，到底有着甚麼樣的心情？其時「新住民」那種強烈的自我矛盾感，通過此文，靜靜地、默默地訴說着。

此外，李黎亦以處於青春期的青年人對於身份的疑惑、認同感的追求作喻，使人更易產生共鳴。就似是現在人們說的「中二病」的「患者」，他們總覺得自己是特別的、獨樹一幟的，總為着自己與他人的「不同」而暗暗自喜。但有趣的是，這種渴望被肯定、認同的心情以及認為自己並非尋常人物的想法，我們每一個人又何嘗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一個階段呢？

有學者甚至指出，〈夜樹〉是在講述性壓抑的問題。那麼這是否李黎老師撰寫此文的意旨所在呢？

「〈夜樹〉的故事雖然是虛構的，但用了相當多的親身觀察印象和少年記憶——當年學校的軍隊式管理、社會與家庭的思想觀念（尤其在民風更是相對保守的南台灣）、青少年對『性』的無知與好奇……小說中都有觸及與描述。」李黎老師道。

她回憶起從前讀的中學是女校（小說則是男女合校），確實發生過廁所裏出現「塗鴉」的事件。「在那樣的政治、社會、教育思維的背景下，對青春少女造成的衝擊是很強烈又很微妙的，所以我寫進了小說裏。」對於有評者認為此文觸及了「性壓抑」的問題，李黎老師表示這是很銳利的解讀。不過，這只是小說的「意旨」之一，其他的題旨亦即是上文剛提及的——有關那些隨國民黨遷至台灣的「新住民」。

所謂的「新住民」，就是在台灣被稱為「外省人」的族群。李黎老師在一歲時被父母親帶到台灣的，人們稱為「外省第一代」或「外省第二代」。《夜樹》的女主角杜菊珠不僅是不折不扣的「外省人」，而且是住在「眷村」的外省人。

而「眷村」，就是國民政府安置跟隨來台的軍人眷屬的生活聚落。李黎老師進一步說：「台灣在解嚴之後、90年代開始有了所謂『眷村文學』的興起。後來加上電影、電視劇的描繪，原先對『眷村』並不熟悉的人，也對這樣一處具有特殊歷史背景和文化特色的社區以及相關人物產生了興趣。」

李黎老師並非在眷村長大，但因為有眷村的親友，因此她對這些人物和他們的生活圈相當熟悉。「在情感上我能認同他們的心態與命運，他們的自尊與挫敗、鄉愁與夢碎；所以早在還沒有『眷村文學』這個詞的時候，我就藉杜菊珠這個女孩，描繪了這個特定歷史時空下的一種家庭背景。」

「新住民」那種強烈的自我矛盾感、對於身份的疑惑以及認同感的追求讓他們陷入苦思。同為其時人們口中的「外省人」，李黎老師亦偶有感到被排斥，但她卻從來沒有過身份認同的疑惑。「作為在台灣的所謂『外省人』，雖然我在台灣長大、受教育，把台灣當作自己的故鄉，同時我知道並且也相信自己是一個中國人，這兩

個認同毫不衝突。」

雖然老師在國外生活了大半輩子，但她並沒猶豫跟人說自己是「Chinese」的身份。她認為這個「中國」是廣義的、文化的，乃至於文學的。老師在台灣大學唸的是歷史系，雖然她說自己『改行』寫作了，但至少學到一個最基本的觀念——「朝代、政權、國號、省籍（更不要說甚麼色彩和政黨）在歷史長河中不過是朝夕之事，文明積累的智慧 and 民族文化的傳承才是巨大、穩固而重要的東西。」

現時，您對於自己的身份又有甚麼體會或看法？與從前有甚麼相異之處呢？

李黎老師亦表示，她完全可以理解像杜菊珠父親那樣的人：在大陸上已經飽嚙戰亂顛簸流離之苦，內戰之後離鄉背井來到一個把他當外人的異鄉，不僅物質生活困頓無望，精神上也充滿疑懼不安；更不用說小說裏那個從家鄉被殘酷地「拉伕」到台灣的老兵「老魏」。

「他的原型正是無數孤身來台，退伍下來作門房、警衛甚至雜役的老兵們。」對於李黎老師而言，從小她身邊周遭就有不少這樣的「外省人」，故他們的形象和身後的故事深深的烙印在老師的記憶中。老師兩年前出版的童年回憶《昨日之河》裏，便不乏這些大歷史下的小人物的素描——「他們的面容是一整個中國近代歷史的圖像。」老師道。

雖然李黎老師在國外生活了多年，她的家亦從台灣「搬」到了美國了。「但通過即時的視聽和大量閱讀，以及頻密深入的回歸行旅，我跟國內沒有感到任何隔閡。現時的我，對於昔時關懷的對象與想法未有改變，而漫長廣闊的時間和空間，只有更加深了我原就具有的歷史感。」

《初雪》，可說是老師經歷了保釣運動後思想、心態上之改變的筭記。早於二十多年前她已就海峽兩岸的關係表達了強烈的關注。不知她對於現時大陸、台灣的關係、發展有甚麼願景呢？

「釣運」之後，李黎老師回歸文學，並且回國尋文學之根去了。從70年代後期開始，她頻密去大陸尋訪老作家，為文學史作見證。

她去年在台灣和大陸分別出版的《半生書緣》，就是記述從三十多年前、半生以來十二位親炙的兩岸作家們：茅盾、巴金、沈從文、丁玲、艾青、錢鍾書、楊絳、范用、劉賓雁、李子雲、殷海光、陳映真。「（我）因文學書寫而與他們結的緣。」

當李黎老師逐篇寫完每位作家的題記之後，她悚然發現：每一位書中人，在他們各自生活的海峽的兩邊，都遭遇過來自他們自己政府的壓制迫害，甚至牢獄禁錮。「是巧合嗎？還是我不自覺的選擇？是因為他們的年齡（從最年長的、生於 1896 年的茅盾，到最年輕的、生於 1937 年的陳映真），正逢上了從五四、抗戰、內戰到國家分裂的那個動盪的年代、那段酷痛的歷史？」老師想。

顯然，正如老師所言，這些作家都是那段中國歷史的映照，一群知識分子的範本。「尤其是，但凡有理想、有才華、有風骨的寫作者，身處那個時代，無論在海峽的哪一邊，都無法逃脫政治的渦漩吧。」老師繼而指出：「也就是說，他們無論生長在中國的哪一處，從 20 世紀初直到 1970 甚至 80 年代，作為一個有理想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就難免經歷了那段歷史為他們鋪排的命運。」

「如果問我個人對整個歷史的未來有甚麼『願景』，那就是歷史不要重演——每一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書寫者，都不再會重蹈上個世紀那些人物的悲劇命運！」

後記

記得在擬訂訪問題目之時，曾讀到《文學途上，離家與歸鄉——駱以軍對談李黎》。當時，李黎老師說到：「我這人對於語言文字是如此的敏感，甚至覺得文字的溝通重要過於一切、更能夠完美的表達思想情感；……」事有湊巧，是次之訪問正正以筆談的方式完成。老師回電郵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十分樂意與年青人分享。

對於接觸電腦、網絡可能比書本、文學還要多的我這個「九十後」，無論是「黎陽」、「薛黎」，還是「李黎」，起初我也很陌生。

到底甚麼是「文學」？何為「好」的文學作品？李黎老師亦耐心的為我解惑。

文學是……？

李黎老師：我很不喜歡給有關文學的事物下定義。非要我下不可的話，就是：用文字描述、表達具有對自然和人文關懷的情感的书寫；形式可以是詩歌、散文、小說、劇本等等。

「好」的文學作品是……？

李黎老師：每個人會有他自己的標準。我的標準是：文字優美，情感真摯，思想內容有啟發性，主題有普世價值，值得一再細讀，能夠通過漫長時間的考驗，和眾多讀者的篩選之後而被肯定的。

不知各位在學生時代曾否有過這樣的疑惑：究竟教科書上對文學作品的詮釋或分析到底有否曲解或錯誤理解了作者撰文之原意？對此，李黎老師也有她的一番見解——

當一篇作品被閱讀時，詮釋的權力是屬於讀者的。讀者對創作的原意、作品的主旨和內容要如何理解或解讀，多半基於讀者個人的人生和閱讀經驗以及脾性和品味，無所謂曲解或錯誤。即使（而且非常可能）那不是作者的原意，作者也無能為力。

教科書上對我的文章作出的詮釋和分析也同樣來自某些讀者，而他們是擁有詮釋權的教學者，他們依據自己的閱讀意見來出題考學生，尤其是選擇題和是非題，說實話我自己都不見得能回答得出他們的「標準答案」。